

麥德樂出使雍正朝與其翻譯策略

李長森

[提要] 清代康雍兩朝，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由於禮儀之爭而陷入困境，澳門亦由於海禁及其他各種原因而危機重重。為使清廷改變對天主教的態度及舒緩居澳葡人的困境，葡萄牙國王若望五世以恭賀雍正皇帝登基為名派出麥德樂出使中國。由於此次出使任務艱巨，麥德樂吸取前朝羅馬和里斯本多次遣使來華失敗的教訓，為了能夠與雍正皇帝順暢溝通，在使團翻譯組成問題上頗費心思。本文旨在通過對麥德樂出使過程翻譯策略的研究，說明翻譯在清代中葡關係中的作用。

[關鍵詞] 麥德樂 出使 雍正 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 K24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3 - 0023 - 10

天主教傳入中國後，以利瑪竇為首的一批耶穌會士在傳教中採取適應政策，尊重中國禮儀，對於教徒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使天主教在中國得到迅速發展。然而，利瑪竇去世後，天主教各修會及傳教會之間就傳教政策問題出現分歧，耶穌會內部亦有爭議。爭論的焦點是：儒家經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 Deus 具有同一意義？敬天、祀祖、祭孔是否屬於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動？後來，這場爭論演變成禮儀之爭。康熙三十二年（1693），擔任福建代牧的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顏瑤^①突然下令，禁止轄區內中國教徒祀祖敬孔。顏瑤的這一舉動將禮儀之爭推向高潮，在中國和歐洲引起激烈爭論。

一、出使緣由

康熙三十九年（1700），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耶穌會士聯名上疏朝廷，一方面表明他們對中國禮儀的看法，一方面請求皇上頒諭，證明中國禮儀與宗教無關。收到奏疏當天，康熙帝立即硃批：“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②耶穌會士收到批示後，立即派人送往羅馬。然而，羅馬教廷卻採取了相反的作法。1704 年 11 月，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置康熙帝的看法於不顧，作出了在傳教過程中禁止中國禮儀的決定，並派遣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出使中國，解決禮儀之爭。

1705 年，多羅抵華。康熙皇帝十分有禮地接見了他，並耐心向多羅解釋中國禮儀，說明祀祖、

祭孔、敬天決不是迷信，並明確指出：“中國之行禮於牌，並非向牌祈求福祿，蓋以盡敬而已。此乃中國之一要典，關係甚巨。”並強調：“爾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與中國敬天之語雖異，但其意相同。”^③可是，多羅依然堅持傳教過程中禁止中國禮儀的立場。為解釋禮儀問題，多羅向康熙推薦了顏瑄，說他精通中國文獻，通曉中國事務，建議召顏瑄北上。1706年8月初，顏瑄入京謁見康熙。

然而，自稱對中國語言文化十分瞭解的顏瑄卻因來自福建而不精宮廷官話，康熙便命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充任翻譯。據說康熙皇帝讓顏瑄辨認掛在室內的一幅條幅，上有四字，而顏瑄只認出其中兩字。至此，康熙眼中的顏瑄已與多羅的描述完全不同：“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識丁。”^④多羅請顏瑄入京，本想讓其通過在中國傳教的實踐和經歷說服康熙皇帝認同羅馬教廷的立場，未料康熙接見顏瑄後對此類教士更加反感。於是，康熙皇帝下令將顏瑄逐至澳門，1706年底，顏瑄取道愛爾蘭返回歐洲，在羅馬度過餘生。

然而，多羅仍採取對抗態度。1707年1月，他在江寧（今南京）公佈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文件，要求傳教士無條件執行，結果被驅逐出境，拘禁於澳門。康熙還嚴斥：“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⑤1710年，多羅死於澳門獄中。儘管如此，康熙帝仍希望教廷能改變態度，撤銷禁令。

1720年，教皇特使嘉樂（Carlo Mezzabarba）抵華。此次陪同他來京擔任通事的是澳門耶穌會士李若瑟（José Pereira）。嘉樂於9月26日抵達澳門，澳門主教嘉素（João de Casal）^⑥及天主教“各修會與傳教會教長十分尊重這一決定，並於1720年12月將雙手放在嘉樂手上宣誓。”^⑦毫無疑問，他們把在華傳教士的命運和澳門未來的希望均寄託在羅馬教皇派來的這位使者身上。嘉樂到京後，康熙帝仍以貴賓相待，多次接見，同他進行說理辯論。康熙帝對禮儀之爭表現出極大的耐心，不願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決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721年1月，傳教士竟將教皇禁令譯成中文，進呈御覽。康熙帝閱後憤怒批示道：“覽此條約，只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⑧從此，康熙帝對天主教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與羅馬教廷徹底絕裂。雖然嘉樂宣布教皇諭旨時，附加了八項變通辦法，以示讓步，但並未使康熙改變主意，傳旨：“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⑨

1721年3月，嘉樂一事無成返回歐洲。而康熙皇帝則於同年“再次拒絕教皇禁令中的要求，停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正式開始實施1717年就已經頒布的禁止歐洲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禁令。”^⑩從此，由利瑪竇等人開創的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進入低潮。原本是天主教各修會及傳教會內部的爭論最終導致中國政府的致命性干預。

雖然康熙帝與羅馬教廷決裂，頒布了禁教令，但並未真正嚴格實行。清廷所驅逐的只是未領印票的傳教士。凡有一技之長的傳教士，履行手續向清廷領取印票之後，便可留居中國。另外，康熙帝並沒有改變招徠西洋科技人才為清廷服務的方針。於是，仍有大批掌握西洋科學技術及特殊技藝的傳教士留在北京為宮廷服務。同時，清廷於1721年派遣張安多（António de Magalhães）神父作為特使赴歐，再次向教皇闡明康熙帝對傳教的立場。

毫無疑問，禮儀之爭及海禁對澳門造成極大影響。在羅馬教皇向康雍兩朝頻頻派出使團之際，里斯本王室亦十分關注澳門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嘉樂出使失敗，使葡萄牙國王更加擔心澳門

的未來。作為崇尚天主教並擁有東方保教權的葡萄牙，自然對禮儀之爭造成的後果十分關注；同時，葡萄牙王室對澳門的社會經濟形勢能否保持穩定，對居澳葡人能否在如此艱難的形勢下繼續生存更加重視。於是，在嘉樂返歐不久，葡萄牙國王便決定派麥德樂（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以祝賀雍正皇帝繼位名義出使中國，試圖說服中國皇帝對澳門採取更加寬容的政策。

二、遣使來華

1725年4月12日，受葡萄牙國王若望五世派遣，麥德樂攜帶國書及三十箱禮品，隨張安多等九位神父，乘坐奧利維拉聖母號帆船從葡萄牙特茹河口出發，經巴西里約熱內盧和印尼巴達維亞前來中國。行程歷時一年兩個月，於1726年6月抵達澳門。為表達葡方出使誠意，麥德樂還帶來若望五世國王致雍正皇帝的信函：

欽惟聖祖仁皇帝愷澤溥施，聲名洋溢，私心感慕，久切於懷。凡我國臣民寓居中國者，莫不多方顧復，事無巨細，備極周詳，蓋數十年來於茲矣。復差我國之臣張安多，附齎珍品，俾遠國深知德意無窮。心領之下，正圖竭蹶報稱，忽聞各路驚傳聖祖仁皇帝大行之慟，心中傷感，不勝思慕之極。恭遇我皇嗣位，丕顯前謨，遂稍解此中迫切之情。欽惟我皇純孝至仁，續承鴻業，當日往來之盛典，自然濟美於今時。竊自不揣，特差大臣歷山麥德樂航海而前，趨朝恭賀，以申數萬里外嚮慕之忱，與前無異，庶幾自今以後，更相得而益彰也。不盡之言，使臣自能口達，惟望俯垂鑒納，曲賜優容。臣使臣小心敬謹，必能仰合我皇之心也。^①

由於此行關係到澳門未來前途，故麥德樂及其隨從受到澳葡當局和市民的隆重歡迎，各砲臺和戰船禮砲齊鳴，水陸官兵組成儀仗隊，人們希冀這位大使能舒緩雍正對天主教的厭惡情緒，進而改善澳門處境。麥德樂抵達澳門後，被安排在位於南灣的弗蘭西斯科（Francisco Leite）家大宅中下榻。該幢別墅後改建為澳門總督府。

麥德樂1687年生於葡萄牙東北部山區馬里亞爾鎮，完成預科學業後進入科英布拉大學，1712年獲教規及民法學位證書。曾任葡萄牙駐馬德里大使佩德羅（Pedro de Vasconcelos）的秘書，取得外交經驗。表面上看，麥德樂出使中國是禮節性的：感謝康熙皇帝派出使者到里斯本贈送禮物，同時向雍正皇帝登基表達葡萄牙國王的祝賀及問候。而其實質目的則是維護葡萄牙在中國的利益，包括希望善待澳門葡人及在華傳教士。

麥德樂出發前，若望五世就此次出使活動的全部計劃與安排向麥德樂做了二十九條指示，或者說規定了二十九項任務。除使團組成、財務安排、旅行船隻以及到澳門後的入華準備等問題外，最重要的就是澳門問題了：“除上述談判內容外，你等應提出澳門城之政治利益問題，盡一切可能要求皇帝增加澳門同華人之貿易，及保持居澳葡人在已故皇帝執政時期所取得的自由。如果此有任何變化，須竭盡努力予以解決。”^②看來，麥德樂的任務十分繁重。

麥德樂一行抵達澳門時，康熙帝已駕崩四年，雍正早已嗣位。照理說使團應立刻進京，但考慮到此次出使關係重大，況且雍正皇帝對禁教一事態度堅決，需時商量對策，保證出使成功。其中最為困難的，就是商討出使對策和文書文件的準備。故安排供職清廷的張安多神父等人先行回京，麥德樂一行則繼續留在澳門，直至11月底，葡國使團才出發北上。使團一路舟車勞頓，歷時半年，於1727年5月18日抵達京城。

雍正四年八月初五日（1726年8月31日），廣東巡撫楊文幹就“外洋歸誠心切，遣員入貢

事”奏報朝廷：“竊西洋人張安多於康熙六十年奉差回國，並齎頒賜物件。今該國王聞聖天子新登大寶，向慕心殷，專遣親信內員麥德樂恭捧表文方物，航海遠來，虔誠朝貢。查西洋原非常貢之國，理應具題請旨，方可令其進京。但麥德樂等急求瞻天仰聖，不敢在粵稽留。今張安多擬於八月十三日先行進京，麥德樂擬於九月初旬進京。臣因該國王係朝賀聖天子嗣位，非同泛常，是以加意優待，以仰體皇上柔懷遠人之至意，並不敢延緩，阻其向化之誠。”^④

張安多神父於1726年11月19日先期抵京，稍事休整後便於25日入覲覆命，並向皇帝引見了隨麥德樂來華的天文曆算家陳善策和麥有年兩人。^⑤因張安多完成了康熙帝派其赴歐與教廷及葡國國王溝通的使命，並伴同葡國使臣麥德樂來京，雍正對其大加獎賞，命令賜張安多緞胎熏貂皮帽一頂，並欽點其擔任麥德樂使團的專門通事。至此，麥德樂尚未進京，便有了第一位翻譯。由於禁教及海禁等事，雍正皇帝對葡人來意頗有戒心。此前，曾遣其十三弟怡親王胤祥詢問張安多神父，葡國使者此行是否為傳教事務而來。張安多十分謹慎地表示，使者前來是對康熙駕崩表示哀悼，並對雍正登基表示祝賀。同時婉轉請求大清皇帝保護居澳葡人。雍正對此回答並不十分滿意。^⑥據巴多明回憶：

十三皇弟受雍正皇帝之命處理重要國家事務及有關我們的事務，他向張安多神父問了許多有關這個使團的問題。我給他當翻譯，因為他有點忘記了以前學的中文了。張安多神父回答說：“大使沒有向我們說其他的事，只說他是受國王之命向皇帝陛下來弔唁他的父親康熙皇帝並祝賀皇帝登基的，同時請求他庇護澳門的居民們及其他在中國的臣民們。”^⑦

雍正的態度緣於海禁和教禁。然而，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亦多顯大國懷柔。雍正前期嚴格執行海禁，但後來考慮沿海百姓確實因海禁而飽受疾苦，於是雍正五年重開洋禁，允許民人往南洋貿易。海禁施行於閩、粵兩省，對澳門造成嚴重影響。雍正對當時鴉片貿易的政策亦較寬鬆：販賣毒品者自然嚴懲不貸，但嚴格區分藥用鴉片與毒品鴉片。毒品嚴禁，藥用不干涉，且照顧小本商人的正當利益。對於教會，仍竭力反對天主教在中國民間的傳播，但同時對天主教也並無惡意，故對西歐來的使者，雍正亦能以禮相待。

葡國使團十分瞭解雍正的態度：若觸及底線，雍正必會堅持原則，不予讓步。於是，一方面千方百計討好雍正，送上大宗禮品；另一方面，在覲見中國皇帝過程中小心行事，謹言慎行。張安多神父的表現正基於此。為達此目的，使團精心挑選譯員，甚至組成陣容強大的通事團隊，其中包括不同的代表人物，以保證溝通過程中萬無一失，不致於產生誤解和誤會。

三、翻譯團隊

麥德樂一行數十人浩浩蕩蕩來華本來是打著祝賀雍正繼位旗號的，使團抵達澳門時雍正早已登基，但麥德樂卻遲遲按兵不動，未即時出發赴京，與其需要做大量準備工作有關。在諸多準備工作中，組成翻譯團隊尤為重要。麥德樂等人總結前朝及羅馬多次出使失敗的教訓，知道翻譯在同中國皇帝溝通過程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於是做了他認為萬無一失的準備。據史料載，麥德樂在京期間，特別是會見雍正皇帝的過程中，有多人為其充當通事。除了皇帝安排兩名宮廷神父協助溝通外，麥德樂自己又找了宮廷之外的四人擔任通事，而且全是葡萄牙人。在雍正欽點的兩人中，就包括長期居住在北京的張安多神父。張安多神父也是葡萄牙人，由於其與宮廷關係非同一般，被雍正欽點為使團通事。據巴多明信函記載：

葡萄牙國王陛下委任唐·亞歷山大·麥德樂·蘇贊·梅內茲 (Dom Alexandre Metello Souza Menezes) 一個重要又艱難的使命。他和張安多 (Antoine Magalhaens) 神父一起到了澳門。張安多神父是幾年前由康熙皇帝派到歐洲去的。張安多和麥德樂大使首先要解決來自廣東官員們的刁難。廣東的官員們立即派出急使去瞭解他本人、他的隨行人員、他帶來的禮物和他此行的目的。確切地調查了他的旅行目的後，他們通過禮部稟報葡萄牙使團到來了，他們同時也發現他並沒有列在向禮部送錢的名冊中。^⑭

前引巴多明信函內容曾提到“我給他當翻譯，因為他有點忘記以前學的中文了”，說明張安多原來是懂中文的，由於受康熙之命返歐多年，漢語漸有生疏。巴多明神父亦在康雍兩朝為清廷服務。因此，雖然張安多和巴多明為皇帝欽點通事，負責接待葡國使團的聯絡翻譯工作，但麥德樂為保證與皇帝溝通過程萬無一失，又挑選多名忠實可靠的人為使團做翻譯工作，其中包括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副院長李國成 (Caetano Lopes) 神父，耶穌會徐懋德 (André Pereira) 神父和傳教士李若瑟神父，以及在澳門專門挑選的民間譯員若昂·法蘭西斯科 (João Francisco)，陣容強大，各具所長。

麥德樂翻譯團隊的組成不無道理。在該翻譯團隊中，巴多明神父的地位十分重要。巴多明，字克安，1665年9月1日生於法國。在里昂耶穌會公學畢業後，於1685年9月1日進耶穌會初學院。巴神父才智最顯著的表現，是他遇到棘手問題時，能當機立斷而又妥善處理。1698年11月4日來華，1741年9月29日卒於北京，終年76歲。在眾多曾為中國傳教事業作出貢獻的傳教士中，巴多明神父無疑是最傑出的人物之一，不但德業上和救靈熱忱上出類拔萃，而且在漢文和滿文方面的造詣更是超群軼凡。^⑮

巴多明當年隨同鄉傳教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輾轉來華，“行十月而抵中國。康熙帝玄燁善知其人，見其體貌魁偉，十分器重，選派良師授以滿漢文字，不久其遂諳華語文字。其滿語流利程度，與操本國語無異，前此歐人之操華語者，無人能及。玄燁頗喜與之言，輒作長談。玄燁前從張誠、白晉所習之幾何、植物、解剖、醫科等學，至是遂日漸精通。多明常以世界各國之政治、風俗，西洋各國之利害關係相告，玄燁得以重視路易十四之為人，皆賴多明進講之力。”^⑯可見康熙帝對其十分賞識，並挑選最好的教師教其學習滿漢兩種語言。

巴多明神父使康熙對天主教一直保持好感，並給予保護，他本人也受到皇帝一貫尊敬。巴多明憑藉其語言天賦、外交才能與廣泛的科學知識，博得康熙的青睞，得以常侍御側，因而有機會向康熙獻策。如清初進行的全國大地測量即由他提議，這件事在今天看來仍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巴多明精通漢、滿、法、葡、拉丁等語言，曾擔任教廷、葡萄牙和俄國使臣的翻譯，並在宮中教授拉丁文，培養清政府外交人才。雍正皇帝亦對其十分器重，其對教會的忠誠及與雍正皇帝的私交極其有利於麥德樂與雍正的溝通。

同雍正欽點的“通事”張安多相比，巴多明具有明顯的語言優勢。麥德樂帶給雍正的所有信函都是巴多明翻譯的。當麥德樂面對皇帝致葡國國王信函的譯文時，對信中致意部分不符合葡文規範的表達方式大感疑惑。巴多明向他解釋：“翻譯國王信件的時候同中國官員商量過，根據他們的風格，葡文的表達方式並不適用於致（中國）皇帝的信函。”清政府要求葡人通事須與中國官員共同翻譯各種重要文書，不僅語言流暢、內容準確，而且符合漢文風格及規範。^⑰

致於雍正皇帝欽點的另一位通事張安多，麥德樂並非完全放心。這倒不是懷疑張安多對傳教事業及葡萄牙的忠誠，而是考慮到他的不同處境。張安多雖為同鄉，亦是耶穌會士、神父，但長

期效力清廷，未必能在所有問題上與葡國特使保持步調一致。另外，張安多 1721 年受康熙帝派遣返回歐洲轉達清政府對禮儀之爭的態度及對天主教的政策，離開中國多年，語言難免生疏，未必能在會談中流暢地發揮溝通作用。為了保證出使萬無一失，必須在通事問題上做到多重保險，以防不測。為此，麥德樂需要在翻譯團隊中加入另外一些不同背景的人。於是，他邀請澳門聖保祿學院副院長李國成神父^①加入翻譯團隊。據李向玉研究，李國成於 1725 年擔任澳門聖保祿學院代理院長。^②麥德樂出使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改善教廷與北京由於禮儀之爭而日益惡化的關係，說服雍正皇帝解除教禁。而李國成神父作為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負責人，必然對中國傳教情況及禁教帶來的嚴峻形勢十分瞭解。由他親自陪同使團赴京，直接用漢語與雍正皇帝及清廷大員溝通，應能把握交談的氣氛及說話的尺度，最大程度疏通雙方關係，達到出使目的。想必這是麥德樂認為最理想的選擇。

另外，耶穌會士李若瑟亦被麥德樂邀請擔任使團“通事”。李若瑟 1674 年生於葡萄牙里斯本，1698 年受耶穌會派遣來到澳門時僅有 24 歲。他在華工作 33 年，1731 年卒於澳門。李若瑟長期在澳門生活，亦精通漢語，多次入內地擔任使團翻譯。之前最重要的一次是 1720 年從澳門出發，陪同來華的教廷使節嘉樂赴京，以解決禮儀之爭引發的諸多問題，包括康熙皇帝於 1717 年宣布全面禁教的問題。李若瑟多次充當使團翻譯的經歷，使麥德樂深信其定能勝任此次意義重大的出使翻譯任務。

使團中另一位擔任翻譯工作的就是耶穌會士徐懋德，號卓賢，1689 年生於葡萄牙波爾圖市，1716 年與德國傳教士戴進賢（Ignatius Kglar）同船抵達澳門，1717 年奉康熙帝之召進京，在欽天監工作近 20 年，並與戴進賢等共同編撰《曆象考成後編》，介紹刻普勒天文學理論及歐洲天文觀測最新結果，對中西天文學交流做出了貢獻。至麥德樂使團入華，徐懋德在中國已近十年，精通漢文，故能編譯出介紹歐洲最新研究成果的天文巨著《曆象考成後編》。1743 年卒於北京，葬於柵欄墓地。^③

為保證出使任務順利進行，除上述十分重要的教士兼翻譯人員之外，麥德樂還在澳門重金聘用了一位名叫若昂·法蘭西斯科的民間譯員。他說這位民間譯員“是他親自在澳門挑選的”，並稱他是“和善的人”^④。為了聘用該名譯員，麥德樂向若昂·法蘭西斯科支付了 52 新克魯扎多，即 85,600 列依的費用，這差不多相當於葡萄牙王室支付整個使團出使費用的百分之一還要多一點。僅從重金聘用這一點，即可看出麥德樂看重的是翻譯人員的翻譯水準和資質。由此看來，麥德樂入華之前在澳門做的準備工作十分認真充分。

在葡萄牙布拉加檔案館保存的多份歷史文獻中，均有關於若昂·法蘭西斯科的記載。通過文獻中的記載可以證實，若昂·法蘭西斯科既非耶穌會士，亦非來自葡萄牙的西方人士，而是一位出生於澳門的普通土生葡人。也許若昂·法蘭西斯科的此種身份，更有利於其成為麥德樂處理葡萄牙東方保教權之爭問題的最佳翻譯人選。雖然他沒有直接參與業務翻譯，亦無參與重大議題的爭論和討論，在更多情況下更像一個局外人，但正因為如此，他的翻譯可能會更加客觀，更加符合對話雙方想要表達的真正含義。^⑤對若昂·法蘭西斯科的選擇，充分顯現出麥德樂的智慧。

作為對中國語言文化一無所知的葡萄牙使臣，麥德樂對使團翻譯團隊的組成做了充分的思考和準備。張安多雖為耶穌會士，且從葡萄牙一路陪同使團到澳門，但由於其受康熙帝派遣離華多年，漢語生疏，能否勝任如此重要的翻譯任務，令人生疑。更何況張安多為雍正皇帝欽點的“通事”，多少有些不太放心。巴多明精通多種語言，但他亦是雍正身邊的人，加之其為法藉，能否

完全站在葡萄牙國王的立場上，尚有疑問。麥德樂必須想方設法填補出使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各種翻譯漏洞。這是他選用澳門三位教士及一名民間通事擔任使團翻譯的主要理由。

另外，組成翻譯團隊的六人中，既有北京宮廷的，亦有澳門派出的；既有在中國長期生活的，亦有瞭解澳門情況的；既有耶穌會傳教士，亦有民間人士；既有通曉粵語及官話的，亦有掌握其他語言的；既有西方人士，亦有澳門土生葡人。麥德樂希望通過這樣的組合，能達到各取所長，優勢互補的目的。他認為，如此陣容的通事團隊，一定能使自己和皇帝更好地相互瞭解對方的看法，掌握外交談判過程中的所有細節。他完全明白翻譯的重要性，知道翻譯是關乎此次出使活動成敗的關鍵。看來，麥德樂確實吸取了前朝皮萊資由於翻譯不力而導致出使失敗的慘痛教訓。

四、無功而返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麥德樂的周密安排最終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麥德樂抵達北京後，時刻惦記著自己的使命，多次尋機向皇帝表達葡國國王若望五世想要解除教禁保護澳門的意思。但前幾次會見均找不到合適的機會。1727年7月8日，在與雍正皇帝的最後一次會見中，麥德樂想抓住這一時機，無論如何也要向雍正皇帝表達此次出使北京的真正意圖。然而，會見一開始皇帝就提出此次會談用滿語溝通，而能聽得懂並且能翻譯此種語言的只有法國傳教士巴多明，於是麥德樂精心組成的翻譯團隊完全沒有派上用場。據麥德樂後來回憶：

在雍正皇帝安排的最後一次辭別會見中，他安排了三位通事，即法國耶穌會的巴多明神父、葡萄牙耶穌會的徐懋德神父以及我在澳門挑選招募的和善之人若昂·法蘭西斯科。然而，皇帝在那次會見中使用的卻是只有巴多明神父才能聽懂的滿語。這種情況使另外兩名通事完全不知所措。可以推測此種情況絕非偶然，而一定是事先預謀僅讓巴多明一人充當現場翻譯的。^{②6}

毫無疑問，此種形勢不可能讓葡國使臣有機會在最後時刻向雍正皇帝解釋若望五世的計劃及真正意圖，尤其是希望雍正能下令禁止非來自葡國的外國人踏足澳門或經澳門入華。因為巴多明神父很可能早已清楚使團的真正意圖並且將其告知其他傳教士。因此，會見中譯員的安排絕非偶然，亦非巧合，發生在使團身上的一切都是雍正皇帝與巴多明故意安排的。滿語當然是雍正皇帝十分熟悉的語言，而使用滿語可以體現清王室的威嚴。但前幾次會見並未使用滿語，唯一的原因是為了讓麥德樂帶來的可信任的同鄉通事無法發揮溝通的作用。

在此種情況下，葡國使臣自然由於自己帶來的通事幫不上忙而無法插話，同中國皇帝的對話也就不可能按照自己原先的設計向前發展。麥德樂面對雍正皇帝而顯現出來的無能，見於有關麥德樂的許多其他歷史文獻中。“皇帝一開始就講滿語，兩位葡籍通事變得非常沮喪，因為在傳教士中只有法國來的巴多明神父通曉滿語。”^{②7}有些文獻對此次會見有另外的記述，認為葡國使臣在會見中表達了自己的意思，但引起雍正的不滿。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②8}在其書信中記載了這次召見的情況。雍正皇帝在會見後對巴多明說：

倘若爾將事實真相告訴了麥德樂，倘若爾對伊正確地解釋了朕所講的道理和意圖，伊是絕不會對朕說出那樣的話的。伊請朕下令歸還所有的教堂，並允許傳播爾等的教義，就象父皇康熙在世時那樣。請爾等聽朕之言：爾等要轉告在這裡和廣州的所有歐洲人，並且要儘快轉告他們。倘有別的使臣再來，爾等應事先告知他們，要他們注意，不要象麥德樂那樣講話。當麥德樂清楚了朕之理由後，他也会贊同朕的這些道理的。即使羅馬教皇和

各國國王親臨吾朝，麥德樂提出的那些要求也會遭到朕拒絕的。因為這些要求沒有道理。

假如有道理，爾等一經提出，朕即會贊同。請不要讓爾等的國王也捲到這件事中來吧！^②

然而，無論會見時的場景是怎樣的，麥德樂都是失敗者。該事例說明兩點。首先，語言及其表達對建立及保持澳門與明清兩朝政府的順暢溝通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發生矛盾及衝突的情況下。正因為如此，麥德樂做了十分認真而細緻的準備；另一方面，順暢的溝通必須建立在雙方互信、友好且有誠意的基礎之上。若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則會造成誤解，甚至故意設置溝通障礙，使不同語言的轉換無法進行，形成雞同鴨講的局面。雍正皇帝就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阻止葡國使臣談論自己不願涉及的問題，既非失禮，又讓對方無法得逞。翻譯的詭譎，可見一斑。

對於使團來說，關注翻譯團隊的組成，重視翻譯人員的溝通能力及掌握語言的程度固然重要，也是保障溝通順暢進行的第一要素，但語言背後的文化問題及社會政治問題亦是需要認真考量的重要因素，尤其在交往過程中出現嚴重歧義時，會使溝通的可能和效果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溝通雙方在相互交流，不如說在彼此鬥智。而翻譯在此時往往會陷入無所適從的尷尬境地而失去作用。由此，亦可以看出翻譯工作者在政治衝突及外交矛盾中的困難處境。澳門傳教士努力學習漢語固然重要，但適應中國國情及文化更加重要。禮儀之爭，便是一例。

1727年7月18日，葡國使團離京赴澳門，踏上回國路程。為彰顯禮儀之邦的寬容大度，雍正皇帝命令御史常保住伴送麥德樂一行南下，經江蘇、浙江、江西前往澳門，並授意各地官吏熱情招待，厚待使團，希望葡國使臣親眼目睹大清帝國的昌明盛世和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廣州署理巡撫石禮哈奏報雍正皇帝：“本年十月十二日，欽差御史常保住奉旨送玻爾多斯國使臣麥德樂回廣州，本月二十一日，自廣州起身，二十六日到澳門。因使臣麥德樂感激聖恩，留御史常保住在澳門公同頌祝萬壽，於十一月初四日，御史常保住回廣州。今於初六日回京覆命。”^③

雖然麥德樂出使未能成功，但其於12月8日回到澳門後依然受到澳葡當局和市民的熱烈歡迎。時逢雍正壽辰，為感謝中國皇帝“深仁厚澤”，便於十一月初一（12月13日）率“異官商民，排列行禮於天主堂，誦經恭祝聖壽”。^④1728年1月17日，麥德樂一行在澳門北灣登上天主聖母號帆船黯然起錨回國，於同年11月21日抵達葡萄牙。麥德樂一行數十人出使中國，歷時三年七個月零九天，行程數萬里，耗資巨大，一路艱辛。然而四次覬見雍正皇帝均無機會表達葡國國王意圖，落得無功而返的下場。

澳門為麥德樂出使中國付出沉重代價。葡國王室為此行撥出的經費絕大多數由澳門承擔，共花費白銀三萬兩。^⑤澳葡政府傾其公庫所有仍不足，不得不由教會及私人捐贈五千兩，使團才得以啟程回國。澳門不但未能得到預期的結果，反而因負擔出使費用而使財政大傷元氣，直至1762年才恢復正常財政運轉。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這次出使最後的一個結果是讓澳門的管理者沮喪，因為沒有給他們在中國和葡印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帶來任何改善。”^⑥

①顏璫（Charles Maigrot, 1652~1730）是中國天主教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禮儀之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顏璫生於法國巴黎，自幼虔信天主教，24歲就已晉鐸。1680年入巴黎外方傳教會，1683年隨該會創

始人之一陸方濟（François Pallu）主教來華傳教。他所發佈的禁令激化了禮儀之爭，直接導致清廷與教廷失和，使中國天主教面臨被禁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艱難局面。關於顏璫的生平和“禮儀之爭”中的活

動，參閱Claudia von Collani, *Charles Maigrot's Role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D. 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 149-183; Adrian Launay, *Mémorial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is, Séminaire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1916, pp. 417-423.

②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17頁。

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872條。

④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11，“論西洋人”，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年影印本。

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資料》，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2頁。

⑥嘉素（1641～1735），葡萄牙維德堡人，1690至1735年任澳門主教。其領導澳門教區長達45年，為澳門天主教史上僅有。

⑦ *Os jesuítas em Macau*, publicada pela 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p. 185.

⑧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14，“教王禁約釋文”。

⑨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40頁。

⑩ *China in Transition, 1517-1911*, Dan J. Li, tran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69, p. 22.

⑪《雍正五年四月十三日（1727年6月2日）葡萄牙國王若望為雍正帝繼位遣使恭賀表文譯稿》，原文形成時間為1725年2月16日，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一）檔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1頁。

⑫ Mariagrazia Russo, *A Embaixada enviada por D. João V ao Imperador Yongzheng (1725-1728) através da documentação do Arquivo Distrital de Brag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I. P., Lisboa, 2007, p. 35.

⑬《廣東巡撫楊文幹奏報葡萄牙國王所遣使臣麥德樂急求赴京情形摺》，見《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七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

編》（一）檔案卷，第150頁。

⑭陳善策（Domingos Pinheiro, 1688-1748）和麥有年（Paulo de Mesquita, 1696-1729）兩人均為耶穌會士，精於天文曆算。1725年隨麥德樂使團出發來華，但先於麥德樂抵京。其中陳善策在京為清廷服務22年，曾任副主教，領導葡萄牙在中國的傳教使團，1748年去世，終年60歲。麥有年則於抵京三年後英年早逝，終年33歲。詳見佛朗西斯·羅德里格斯：《葡萄牙耶穌會天文學家在中國：1583-1805》，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0年，第115～116頁。

⑮⑯ Andrew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 pp. 96-98, 102.

⑰⑱《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會尼埃爾神父的信》，見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II》，朱靜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29、228頁。

⑲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509～525頁。

⑳㉑鞠德源：《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年譜——兼在華耶穌會士史事稽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

㉒㉓ Mariagrazia Russo, *Traduzir e Interpretar Embaixadores: O caso de 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 in *Para a História de Tradução em Macau*, IPM e CCCM, Lisboa, 2012, pp. 85-86, 86.

㉔李國成（Caetano Lopes, S. J., 1690～1735），葡萄牙傳教士，天文曆算家，曾在多種場合擔任重要翻譯工作。麥德樂事後在多種文件中都提到他：“這位大臣十分隆重地來探訪我，並同我做了長時間的談話。在場做翻譯的是李國成神父”；“我讓李國成神父翻譯廣東大員寫給我的信件，他當時是澳門神父中最精通中文字的專家”；“我還帶上曾任澳門聖保祿學院院長的耶穌會士李國成神父。”分別見 Mariagrazia Russo, *Traduzir e Interpretar Embaixadores: O caso de 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 in *Para a História de Tradução em Macau*, pp. 181, 183, 190.

㉕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99頁，注明為代校長。據麥德樂認為，李國成口筆譯皆十分精通，尤其熟知官方文書的翻譯方法。詳見 Mariagrazia

Russo, *Traduzir e Interpretar Embaixadores: O caso de 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 in *Para a História de Tradução em Macau*, pp. 85-86.

②北京柵欄墓地有徐懋德墓碑保留至今，用拉丁文和漢文兩種文字刻成，碑文如下：徐先生，諱懋德，號卓賢，泰西玻爾都噶爾國人。童年入會，立志貞堅。時值康熙五十五年親來粵東，聖教廣傳一十四載，終日乾乾。雍正甲辰奉旨傳宣，授職監副，管理欽天內外治事，獨著精專，闔會善士，頌聲萬千。天主命至，功完德全，乾隆癸亥遂善終焉。帑銀二百，皇恩無邊。計在會中三十六年，五十四歲，享壽綿綿。勒諸貞石，榮光常懸。見林華等：《歷史遺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33～134頁。

③根據葡國國王若望五世給麥德樂的第四項指示，王室支付5,000克魯扎多作為出使費用。Mariagrazia Russo, *Traduzir e Interpretar Embaixadores: O caso de 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 in *Para a História de Tradução em Macau*, p. 86.

④ Mariagrazia Russo, *Traduzir e Interpretar Embaixadores: O caso de 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 in *Para a História de Tradução em Macau*, p. 223. 另外，在耶穌會士中，還有穆敬遠 (João Mourão) 通曉滿語，但當時已去世。

⑤ Carta de 18 de Dezembro de 1727, publ. Julio Firmino Júdice Biker, *Collecção de tratados e concertos de pazes que o estado da India portuguesa fez com os reis e senhores com quem teve relações nas partes da Asia e Africa Oriental desde o principio da conquista até ao*

fim do seculo XVIII (1881),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81-1887, t. VI, p. 48; e Eduardo Brazão, *Relações externas de Portugal, reinado de D. João V*,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38, vol. I, p. 467.

⑥宋君榮 (Antoine Gaubil, 1689-1759)，法國蓋拉克城人，出身貴族家庭。1723年4月9日來到北京。其亦精於翻譯，除曾作為譯員出使俄國和去新疆測繪地圖外，始終在京居住直到去世，在華三十餘年。

⑦宋君榮：《有關雍正與天主教的幾封信》，見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44～145頁。

⑧《廣州將軍石禮哈奏報常保住送葡萄牙使臣至澳門事畢回廣州即將回京覆命摺》，《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一〇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一）檔案卷，第153頁。

⑨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 XVIII, Volume 2*, DSEJ, Macau, 1993, p. 61.

⑩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4.

作者簡介：李長森，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劉澤生]